

瞩望多媒体时代的文学命运

——访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

本报记者 杨晓华

嘉宾简介：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1936年生于福建连城，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第一届主任，曾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组首席专家。其专著《文学概论》、《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文学创作与审美心理》、《文体与文体创造》、《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文学古代文论》、《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童庆炳文学五说》、《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等在文化界影响广泛。

记者：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文学艺术以其丰富、博大和深刻，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但是在当今的多媒体时代看，人们的文化生存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甚至有人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提出了种种质疑。如何认识这一时代发展中的文学的命运？

童庆炳：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的发展，艺术的门类越来越多样化，不再仅限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雕塑，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等。电子媒体不仅使得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开拓出许许多多新的艺术门类，像动漫就是崭新的艺术形式。即使像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都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连续剧就是《渴望》。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文学自然受到冲击，西方学者甚至提出“文学终结论”，喊得很响。讨论文学终结问题在中国是没有历史根基的，可是在西方，数百年间，不时出现为文学辩护、为诗辩护的思潮，像华兹华斯、雪莱都写过同名的文章《为诗辩护》。后来黑格尔也提出文学终结论，认为哲学在某一时期要取代文学。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著名文学批评家米勒提出，文学作品，甚至情书都要终结，因为有电子的手段，纸质的文学作品成为多余。2002年，我和米勒曾经当面讨论。我的观点是文学不会终结，文学是人的生命血脉很自然地延伸出来的精神产品，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只要生命存

在，人的情感存在，人就会需要这样一种表达生命意识和情感的艺术形式。

记者：但是，似乎文学阅读的减少，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感受。

童庆炳：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论证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究现在读文学作品的人是比过去多了还是少了。其实，法国有一家报纸做过统计，认为现在读文学作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这种统计结果可能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状况有关。有的国家的民众可能并不喜欢电子媒介的那种喧嚣、纷乱，而喜欢安静、单纯地读书。在中国，有的人喜欢电子媒体，也有的人嗜书如命。不必把文学神圣化，也不必悲观，文学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文学是艺术家族中最浩大的一门艺术。我们有一个全国文联，但还有一个平级的艺术组织就是作家协会，其中的道理也在此。

事实上，中国文学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学的重要性首先通过诗歌表现出来。《诗经》中的“风”其实就是各地的民歌、老百姓吟唱的歌谣，是作为统治者考察民情民心的依据。中国的第一大诗人屈原，通过诗歌抒发自己的爱恨与愤怒。两汉的史传文学，发挥着总结历史兴衰、探究社会规律的作用。到了曹丕那里，文学、文章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了隋唐，诗歌成为科举选拔的重要科目，文学的地位更加突出。宋以后，填词作曲变成一种正式的职业。可见，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中国人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一直有着审美的和现实功利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古代中国，不可能有文学终结的说法。

记者：在诸多艺术中，您觉得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学不可能被其他艺术形式取代？

童庆炳：按照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说法，语言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音响，一个是概念。面对一棵树，我们发出shu这个音，同时，我们说shu的时候，头脑中出现一个概念……树的音响、形象，就是所谓的能指，它还包含审美形象，包含意味。郭沫若留学日本的时候，学写短小的俳句。有个日本人写了一首：松岛——松岛——松岛啊——松岛。郭沫若就想可以写一首：菩萨——菩萨——菩萨哟——菩萨，词汇形式上是简单重复，但是可以表达强烈的情感。这就是语言的独特之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不会感觉到语言的意义，只是觉得它是概念，如春风、野火，对我们都是一样司空见惯的概念。“群鸡正乱叫”乍一看，很不像诗，但这是杜甫《羌村

三首》中的名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鸣斗。”表达的是安史之乱将结束时对和平、温馨的乡村生活的神往。语言的这种变化无穷的意味，使得文学更深刻，更宏阔，更细腻，整体上是其他艺术种类难以比拟的。

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商业社会，物质产品不断涌现和繁荣的社会，但是精神文明的一些领域却在萎缩。文学和其他的艺术一起，恰恰组成一个人的精神家园。在后现代社会，由于工业生产和市场竞争高度发展，人的精神世界却被挤压、扭曲，变得单薄和干枯，我们确有失去精神家园的危险。文学艺术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种救赎。

记者：我注意到前一段时间，北师大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其立意何在？这是一个推动当代文学创作的教育性机构吗？过去我们很多学者都认为大学中文系应该培养学者，而不培养作家。

童庆炳：我们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其意义一是加强国内外文学界的交流和对话，二是开展文学创作的研究和教学。我们下一步要招学生，他们要正式参加考试选拔，然后进入中心学习，志趣是搞创作。

办好语言文学系应该分两条路来走：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创作。英美国家也是这样，初中文凭，他们的学位论文是可以小说代替的，一个写作专业硕士生，可以用6万字到10万字的小小说获得学位。我们过去对语言文学的认识是片面的：只搞文学研究，不指导创作，不培养作家。结果，我们作家的文化水平一般较低。美国、欧洲各国诺贝尔奖的大都是大学教授，懂好几国语言。我们的作家许多是小学、初中文化，理论素养比较欠缺。更可怕的是一部分作家，还固执地认为作家不需要理论。人是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作家也应该把感性和理性的潜力全部释放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家。一个作家只有把自己的理性认识很好地渗透到作品的感性形象中去，思想才会更深刻，意味才会更绵长。思想上的教条会妨碍创作，但理论绝不等于教条。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向主管部门建议把中文系的写作课改成文章学专业，没有被采纳，成是不成熟。其实文章学是我们所有学科中最有历史积淀、最成熟的专业。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遗憾，为培养更具文化底蕴的新一代作家，做出有益的探索。

记者：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态或者现状，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您是如何看待的？

童庆炳：文学是一个场域，应该包括作家、批评家、理论家、读者、文学传播等等在内，文学批评在这种场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批评家没有见解。为什么？因为批评家自己没有生活体验。他们整天就看作品，从这部到那部，从书本到书本。我认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应该从生活中来，从时代的深处来。他应该用这样的思想独立地评价作品，而不是跟着作品絮絮叨叨。

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意义的深度和广度，往往是由批评家发现的。能够成就大作家的，往往是大的文学批评家，最典型的就是19世纪的俄罗斯。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就不会有那样大师辈出的文学时代。特别是别林斯基，没有别林斯基为普希金写的多篇论文，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父——普希金的价值就很难得到人们的发现和认可。我们今天特别缺少别林斯基这样的，从生活中、从时代深处养成和发展自己独立思想的批评家。

一部文学作品要成为文学名著，需要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经典化过程。陶渊明写那些诗的时候默默无闻。汉魏六朝是大家族统治的社会，如果不像谢灵运等诗人那样出生在大家族，很难进入主流。所以，汉魏六朝末年，萧统编《昭明文选》，虽收了陶渊明部分诗歌，但位置不够，后来钟嵘把陶渊明放在《诗品》的中品中。整个唐代陶渊明的地位也不算高。到了北宋，由于一代文豪苏轼的推赞，陶渊明才最终成为光耀千古的大诗人。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有一些作家在默默写作，但不急于示人。若干年后，新发现的一些作品，有可能比我们了解到的那些要更深刻、更博大。我一直抱有这样的大历史观念：一个人的成就可能不是现在评定的，是在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再去评定的。

记者：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您先后开展了文学特征、文艺心理学、文体学等研究，近些年来，您一直在提倡和实践文化诗学，这种学术路径的选择遵循了怎样的理论和现实逻辑？

童庆炳：我真正的文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从文学特征的研究开始的。当时，文学理论界要面对的是清理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和问题。我提出文学的审美特征论，我认为，文学的特性最重要的是用情感评价周围的事物，包括周围人们的活动。

情感的评价就是审美的过程，文学的成功与否不能局限在个别形象的描写上，要看整体的审美特质。为了进一步论证和研究我的观点，我带了13名师生开展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持续了五六年，到1992年结项，共出了16本书。这些著作其实就是给文学的主体性以审美心理学的解释。

在此之后，我进入了文体学的研究。在鲁迅文学院上课的时候，我深深感到，作家们在创作中，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什么，一个是怎么写，怎么写就是文体。一定的文学体裁要有一定的语体，一定的语体发展到极致，就会有风格，文体是一种三要素的结构。我做了5年左右文体学的研究，编辑了一套丛书出版，影响很大，文体学也很快成为比较热的学问。

之所以进入比较诗学的研究，是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翻译了很多国外的理论作品，不少学者生吞活剥，把理论文章写得艰深晦涩，使读者不知所云。我就把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希望从中国文化的背景中来审视西方诗学，力图把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借鉴过来，形成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架构。

近些年，我一直在提倡文化诗学。有不少年轻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英国威廉斯文化研究学派那里汲取了理论资源，提出要把文学理论批评变成文化批评。我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是文化批评，文学批评是审美研究，而文化批评是社会学研究。引进社会学的视角对文学批评是有益的，但是把文学研究泛化，就背离了文学活动的主旨。与此同时，我觉得，过去的文学批评也的确缺少文化内涵，为此，我就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格朗布拉特提出的。他在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演讲中，用了个题目：走向文化诗学，当时我并不知晓。

相差几乎一年时间，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学术讲坛上用的题目也是：走向文化诗学。题目完全一样，但我们的意思是有差别的，他是在研究莎士比亚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要从历史语境中加以探究；我是想在文学批评中加入文化这样一个视野，因为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和别的文化存在往往交融在一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更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对的美学性仍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中的文本细读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研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的真实面目。

去年我去了淮南的敬亭山，那里有一座唐代玉真公主的纪念碑。人们说，玉真公主晚年在此修道，说李白在此经常与玉真公主会面。《独坐敬亭山》写的就是对玉真公主的感情。回来后，我查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发现玉真公主的道观都在长安、洛阳、王屋山，一生没到过淮南，李白和玉真公主也不可能那样深的交情。后来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发在《河北学刊》上。这样分析的东西是比较确实的，比较有文化内涵的，不是随意的单薄的主观印象。

记者：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和世界的交流日益深入，您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学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提高和壮大自己？

童庆炳：一定要坚持198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文艺思想。邓小平同志讲：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提法不再提了，写什么、怎么写，应该由作家自己去解决。这样的观点是对文学的大解放。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作家在创作中，一定要珍惜创作的自由权利，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自觉加强个人的文化素养，用中国古代的文化、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西方的文化来充实自己。

很多人热爱文学，从事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以后作家的文化水平会提高。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平凡与伟大之间的「仪式」

汾灵

铁路巡守员计文革的“仪式”很简单，火车驶来，在固定地点面向火车头站直，右手举起信号棒；火车经过，转身，目送火车运行。但是，这样的仪式，每天发生在最低温度零下36度、北纬52度的漠河，计文革每天迎接17对列车，动作重复34次，需要往返2公里路反复巡逻，防范落石、滑坡、倒树及其他危及行车安全的危险。暴雨、大雪、寒风、野兽，是这里轮番上演的真实情景，在不通水电、荒无人烟的山林间，计文革啃着馒头、就着咸菜、咬口冰水，为他的“仪式”储存好精力和情感——计文革把坚守岗位的一个常规动作变成了庄严的“仪式”，他说：“这是我们基层人相互间的仪式。”

计文革是平凡老百姓中的一员。本来，他有可能拥有另外一种人生。他从小学到高一都是班里第一，如果坚持上学，他完全可以考上一所大学，在繁华的城市里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是，为了支持上大学的哥哥，为了照顾重病的母亲，他选择了辍学务工，而后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工程兵。然而，在平凡而又不乏艰难曲折的经历中，计文革无意间为一个铁路巡守员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责任心和牺牲精神。这种责任心和牺牲精神并不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但却帮助他在普通的岗位中找到自信与快乐。他吟诵着：“岁月冲洗过的黄马褂，写出了巡守员的生涯。那无数次汽笛的欢唱，不正是你那饱经风霜的情肠。”

世界是有限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事业也是有限的，每一个来到这世界的有限生命都可以在人世间找到自己的道路和责任。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显贵还是无名，无论是伟大还是普通，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坚守。这种不可替代性正是靠责任心和牺牲精神支撑的。是责任心，使得计文革胆大心细，掌握巡守线上每一块石头，每一片丛林的细微变化，熟悉钢轨上每一个缝隙，每一块螺丝的物理状态。责任心使得他在职责所在的空间里成为一个最为灵敏和熟练的专家。是牺牲精神，使得他可以抛妻别雏，在严寒冰冻、风雨侵袭和无尽寂寞中，一丝不苟地坚守自己的岗位，并以此为乐：“钢轨运输线没有尽头，守着一点，虽然是零，也挺自豪。”

曾有血的事实证明，对于列车而言，每一个道路上的点都是同样重要的，一个细微的疏漏，都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正是千千万万个计文革这样遍布中国大地的普通人，中国的列车才能平稳地、安全地穿行在中国的森林、戈壁、平原、山川。计文革们坚守在

礼乐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能为现代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

加强儒家思想的多样化传播

与会专家就儒学在历史上的多样化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给予关注，儒学的传播不仅造成儒学观念自身的流变，同时也影响到不同阶层、不同地域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表示，孔子贡献之一在于将“仁”提升为位居诸德之上的上位概念，提出了“仁者安仁”这一意义重大的哲学命题。孟子则从性命论、形式逻辑和生命经验三大向度提升了儒家仁学的哲学思辨性与逻辑严密性。

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罗伯特·恰德强调，儒学要实现更广泛的传播，必须要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在承认本土文化的价值基础上融会贯通，实现儒学与当地文化的重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息繁衍过程中逐步创造、积累并传承下来的文化复合体可称为“第三极文化”。作为主导文化的儒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派别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以及基于这些核心价值所生成的民族精神。把中国文化更有力地推向世界，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中的影响力，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除此之外，与会学者还就儒家经典文本的解读、经典文献的版本研究、儒家的财富观念、君子人格、“忠信”观念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社会建设离不开儒家思想

——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综述

本报记者 刘修兵

9月27日至28日，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山东曲阜举行，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俄罗斯、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个儒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12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孔子故里，围绕“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建设”的主题，就“儒家思想与生态文明”“儒家伦理与道德教育”“礼乐传统与社会礼仪”“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4个议题进行研讨与对话。

生态建设要“天人合一”

与会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中包含了很多生态智慧，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要充分挖掘这些宝贵的思想和智慧，构建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乔清举阐释了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理论，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理论结构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可对对天的认识和对人的作用两个层面加以认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文明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他表示。

西北大学教授方光华针对中国生态问题的特殊性提出，要努力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道路，构建与我国现代文明形态相一致的生态理论，将生态理念渗透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使生态理念成为文明自觉。积极参与全球生态事务，倡导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价值观念。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李瑞智指出，随着中国和亚洲和平经济的崛起，以抽象、理性、信仰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为寻求全球经济的和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古典传统中寻找智慧。

将“仁义礼智信”融入德育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儒家伦理在完善当代道德教育、提高全民道德素质、提升人生境界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当代道德教育应当吸收儒家伦理中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系列思想精华，并将这些精华融入道德教育，使道德教育内涵更加丰富。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牟钟鉴指出，儒家在历史上不是一家一派的学说，而是集三代文化之大成、为中华民族确立以人为本之文化方向，它面向社会所有的人，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提供伦理原则。儒家未来的演变不宜政治化、宗教化、工具化，应在社会德教位置上发挥作用。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介绍说，在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哲学和文化时，他们会使用对古典传统理论化与概念化的方法。“儒学角色伦理学”意在叙述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特道德哲学，让它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基于将人视为处于互系的关系，将人家庭角色及关系作为修养道德能力的起步，在精神上呼唤道德想象，并能激励通过人的相系而生成的道德，进而为展开道德生活的宽度与立体视角提供根据。

台湾慈济大学教授林安梧则提倡“公民儒学”作为“后新儒学”的社会哲

学向度。他提出，仁恕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现代化造成的“人的异化”，带来“生命的归复”。

儒家礼乐教化有助构建社会秩序

与会专家认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内涵与方法十分丰富，礼乐教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道德，进而对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台湾学者董金裕对《周礼》中“六艺”的源头和内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指出礼、乐、书、御、数、射的教學模式有各自的侧重和培养目标，合于五育并进的育人教育，可作为我们今日的取法之资。

马来西亚儒学研究会署理会长、国际儒联副理事长陈启生认为，应重新提倡传统的“礼”，重塑人们的“敬畏感”，这对于根治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有着积极的价值和重大的意义。

吉林师范大学祖国华教授指出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本质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化外现过程，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秩序性与向善性等特征，强调缓慢渐进。“礼化”功能与“乐化”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状态，对个体道德化与社会秩序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要实现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功能，需在思维路径、资源整合、实践方式等方面下功夫。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长铃认为，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陈旸所著《乐书》是一部重要的儒家音乐文献资料，该书继承儒家传统礼乐观念，对儒家传统艺术观、音乐思想做了系统的阐述，挖掘借鉴其